

诗作同时同地 , 诗味风格迥异

——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沈从文《黄昏和午夜》的阅读体验

袁洪权

(西昌学院 中文系 , 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1949 年新中国成立事件对知识分子造成的心理影响是有差异的 , 本文以两首诗歌——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沈从文《黄昏和午夜》——为评价中介。两首诗的主题明显针对新中国成立事件 , 表现出知识分子在时代选择面前的差异性 : 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表达了诗人的身份优越感——时代的主人、充满朝气的青壮年 , 以及由此身份延展出来的诗歌格调的高昂与雄浑 ; 沈从文的《黄昏和午夜》却结合诗人自己的现实处境表达了他对时局的看法 , 他更像一个被时代遗忘的老人 , 由此身份使诗歌显示出一种低沉而凄婉的风格 , 犹如挽歌的变调。这形成两首诗歌的诗味的迥异。

【关键词】不同诗味 ; 同时同地 (1949 年 9、10 月) ; 《我们最伟大的节日》 ; 《黄昏和午夜》 ; 阅读体验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7)04-0030-05

历史的进程总是在普通人的支持或抵制中缓慢行进。处于“转折时代”^[1]的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也不例外。历史进入 1949 年 9 月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 ; 10 月 ,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面对新中国的成立 , 知识分子表达出了各自的声音。但是 , 欢呼的声音似乎盖过了沉思的声音。每个伟大的时代会选择不同的歌者。一些人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歌者。另一些人在这个伟大时代里却只能以沉默的方式寻求生存 , 他/她与这时代毫无“缘分”。何其芳和沈从文 , 两个性格差异很大的人 , 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伟大时代面前选择了各自认同的不同表达方式。

何其芳作为延安解放区的“歌者” , 1949 年 3 月提前进入北平 , 参加中央高级党校的教学工作 , 7 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 , 分享着胜利者带来的荣誉和喜悦。何其芳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伟大历史的一种记述 , 再一次进入北平的他与过去作为学生的他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 虽然说地点并没有发生改变。在新的伟大的时代面前 , 何其芳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相对增多 , 他期望通过更多的演讲或现身说法

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产生影响 , 使他们认同新社会。这从这年 8 月他参加的一次公开演讲就看出了他的这种心态 : “春天来了 , 恼春 ; 或者秋天的傍晚 , 暮鸦 , 梧桐树 , 镜子里面的瘦削的脸 ; 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什么‘空虚的人生’。总之 , 一点也不象新社会的青年人应该写的东西。……应该写新社会的新事物。”^[2](P175-176) 他明确地表达出对当时文坛写作状况的不满。处于新社会来临的时期 , 何其芳认为文学写作就应该集中写“新社会的新事物” , 新的生活将成为文学的主潮。当然 , 他的身份决定了他的这种想法。

比较而言 , 沈从文却陷入了极度的心理恐惧状态。他立足于北京大学校园文化 , 但随着 1948 年 3 月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发表后 , 他在精神上始终苦闷着 , 脑海中随时想到郭沫若对他的历史定位——“他(指沈从文——笔者注)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3](P617)。1949 年 1 月北京大学校园出现了郭沫若的批判文章的大字报后 , 沈从文的精神彻底被击垮 , 在国家即将新生的历史关头他选择了自杀 , 用沈从文后来自己的话说 , “北京城

收稿日期 : 2007-04-05

作者简介 : 袁洪权 (1978 -) , 男 , 土家族 , 重庆市人 , 硕士 , 讲师 , 从事 20 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学史学研究。

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里病倒了”^[4]。语气显得很委婉,当时沈从文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回答海外及港台对他遭遇的怀疑与疑惑。沈从文确实“病”得不轻。7月,沈从文被排斥在文代会的代表之列。时代遗弃了沈从文,沈从文也远离了时代的主要潮流。自杀没有成功,他留下了许多的呓语,让研究者了解到另一类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面对新中国的诞生,作为诗人的何其芳和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都选择了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这一重大政治事件。《我们最伟大的节日》^①和《黄昏和午夜》^②两个诗歌文本,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在时代面前的不同心情。这两首诗的创作时间几乎一致——1949年9月底至10月初,创作地点完全相同——成为新中国首都的北京。但由于何其芳和沈从文在新社会的政治身份的不同,他们在诗歌中对这一伟大时代的认识产生了根本的差异。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选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天作为诗歌的叙事时间,地点是天安门广场,通过开国大典这重大的历史场景表达了一代受苦受难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道路上的艰难历程,他们最终获得了革命的胜利,当然也表达出了他们此时此地的心情——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何其芳经历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事件后,在文学观念上已经放弃了他原先信仰的校园文化和艺术倾向的文学表达,成为毛泽东文艺的一个坚定战士,40年代后期他已经成为毛泽东文艺的忠实宣传者。革命的目的是唯一的,它将伴随新政权的诞生而终结。新政权作为革命的最终体现,这对于参加革命的人来说,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与它相比。处于浪尖高峰的何其芳,歌唱这伟大的时代是他义不容辞的权利和义务。与胡风同时写作《时间开始了·第一乐章》相比,胡风显得有点犹豫不决,而何其芳显得自然而乐观。沈从文的《黄昏和午夜》选择的是曾经辉煌的“神武门”^③和现在安静的他的“家”:“神武门”在黄昏降临中的衰落景象和北京城市午夜中他在家的思考。沈从文受到来自左翼文艺阵营的批判,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受到各方面的批判,他的政治身份被认定后不得不离开他心爱的文学事业,转入中国服饰研究领域。但沈从文对时代的认识并没有停止,他把他此时的心情投射到所观察的客体身上,使这些客体也染上了感情的色彩,这使

《黄昏和午夜》带有历史的沉重与沧桑之感。他选择了新中国成立事件作为诗歌的意象发生场,但这一切却显得很沉静。

具体到诗歌文本中,我们可以增强感受这种不同的诗歌味道。在《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中,何其芳述说了革命历程的艰难性,这是作为胜利者的革命者的姿态,新中国的诞生“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经历过长期的苦痛,现在“又如此欢乐的诞生/就不能不象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象雷一样发出震动着世界的声音……”何其芳把自己作为胜利的革命者的身份形象地表达了出来。这一胜利也只有象他那样的革命者才配享有。在这样的氛围下,何其芳对过去的革命信念进行了激情的张扬,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在何其芳的心目中,革命目标——伟大的新中国的诞生是不容易的,它是漫长的革命过程,受苦受难的革命经历,“多少年代,多少内外的敌人/用最恶毒的女巫的话语/诅咒着你,/用最顽强的岩石一样的力量/压制着你,/在你开始成形的时候/又用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来企图虐杀你”。但这一切在诗人何其芳看来,终于过去了——“终于过去了/中国人民的哭泣的日子,/中国人民的低垂著头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日本侵略者使我们肥沃的土地上长着荒草,/使我们肚子里塞着树叶的日子;/终于过去了/美国的吉普车把我们象狗一样在街上压死,/美国的大兵在广场上强奸我们的妇女的日子;/终于过去了/中国最后一个黑暗王朝的统治!”连续四个“终于过去了”,诗人内心的激情得到了张扬,过去的日子都是受难的日子,都是中国人民遭受蹂躏的日子,都是中国人民处于奴隶的日子。新中国的成立,在诗人的眼中的份量是如此的沉重,它代表的不再是“黑暗王朝”统治,它代表的是“新的中国,人民的中国”。新中国是诗人理想的具体体现,在诗中,何其芳的自我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是时代的歌者,他是时代的主人。进入沈从文的诗歌《黄昏和午夜》中,我们发现沈从文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他远离了时代的热闹,联系着自身的人生经历,他在历史的陈迹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份文化心态。“神武门”曾经是辉煌的场所,而今在沈从文的眼中却已经变成了另一副景象,“城楼上大钟大鼓灰尘蒙蒙,/沉没暗哑相对已半个世纪。/帝国封建的种种,早成传说故事,/慢慢在时间下退尽颜色,/惟剩余点滴片

段，保留在老人记忆中，/当作生命迟暮的慰藉。”这是沈从文文学心态的一种自然流露。革命横扫了一切，过去帝王象征的“神武门”也是被革扫的场所，它遭受冷落的命运是历史的必然。辉煌，一切记忆中的辉煌，原来不过如此。这对经历沧桑的沈从文而言，真是别样的滋味。

“家”原本是温暖的象征，在沈从文的诗中，他把自己的“家”也隐晦地表达了出来：“‘你得觅路回来到处去，/回到家里去，休息休息，/在孩子们面前展开一张笑盈盈的脸，/让他们感到有个爸爸，/病已行将复原。/让他们生活在应当得到的世界里，/待羽毛丰满，筋骨强健，/好勇敢而单纯，和亿万人民一样，/来准备迎接每个新升起的日头，/在阳光雨露中勤劳手足，/完成社会国家的新生！’/我当真就那么回到家里，/和孩子们坐在阶砌间，/作半年第一次聚会。”回到家的沈从文强撑着内心极大的心理感受，为的是使孩子们不至于在新社会里成为象他一样的异类。这侧面反映了沈从文当时的精神压力。

伟大的时代关照中，沈从文和何其芳显示出如此强烈的差异性，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沉思。为何面对新中国的诞生，他们显示出了如此大的差异？难道沈从文不希望新中国诞生么？显然这样的回答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沈从文在 1948 年的岁末给一读者写信中回答了他对时代走向的总体看法：“大局玄黄未定，惟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则无可怀疑。”^[5]他没有对时代的政治选择做出抵制，而是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试图在时代面前作出自己的选择。但左翼文人阵营极力妖魔化沈从文在社会政治中的形象，使他感觉到融入新社会的艰难程度，他在给人的书信中流露出了这样的艰难：“时代突变，人民均在风雨中失自主性，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得在变动下重新安排。过程中恐不免有广大牺牲，四十岁以上中年知识分子，于这个过程中或更易毁去。这是必然的。个人悲剧虽多，可不用悲观，社会明白却必然会得到进步，年青朋友的知识、经验、热忱，必然可在一个新的发展中，得到多方面使用机会。即写作，为一个新观念而努力，作品又适为新社会需要的，必可得到广大的出路。”^[6]时代是伟大的，沈从文有这样的体会，但时代不需要象沈从文式的文学书写，他逐步被剥夺书写的权利。

两首诗歌中，何其芳、沈从文都提到了缔造新中国的领袖们。何其芳主要突出了毛泽东的革命作用，在题记中就提及过两次，诗歌正文中又对毛泽东的领袖形象进行了深刻传达。他表达了诗人对革命领袖的由衷热爱，这热爱是建立在缔造者对新中国的巨大贡献上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中是这样传达的：“毛泽东，我们的领导者，我们的先知！/他叫我们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就被我们打倒了！/他叫我们喊出打倒蒋介石，/蒋介石就被我们打倒了！/他叫我们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美帝国主义就被我们驱逐出去了！”毛泽东在历史上的作用人所共知，诗人何其芳是没有怀疑的。他表达出了对领袖的崇拜心理：

“毛泽东呵，/你的名字就是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你的名字就是中国人民的信心和胜利！”他的这种诗歌写作姿态，与其说是对胜利的歌颂，不如说是对革命领袖的历史地位的称颂。何其芳关注的是历史的重大场景，在诗歌中，天安门的开国大典是他选取的场景，毛泽东庄严的宣告让诗人内心激动，这一宣布在他的脑海中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过去了，成为历史，“我们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盛大的节日庆典使天安门广场成为欢乐的海洋，“把旧社会留给我们身上的创伤和污秽/喊掉得干干净净！/举着红灯的游行的队伍河一样流到街上。/天空的月亮失去了光辉，星星也都躲藏。/呵，我们多么愿意站在这里欢呼一个晚上！/我们多么愿意在毛泽东的照耀下/把我们的一生献给我们自己的国家！”诗歌显示出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情调，这也为新中国文艺奠定了基调。人们在狂欢的世界里逐渐淡忘着曾经苦难的历史。乐观而浪漫的基调在诗歌的尾声中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沈从文在诗歌中就显得有点模糊，使人产生朦胧的感觉：“毛泽东，刘少奇……不问是谁，/都代表万万苦劳的人民/共同的愿望、共同的声音。”他与何其芳的情感表达相比就显示出话语的低沉和平淡，更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笔锋立马转变，回到了自己深刻思考的历史场所中。即使在《黄昏》一节的最后重新称颂毛泽东思想，传达毛泽东形象，但在诗歌文本的建构过程中，他把作为革命领袖的形象消解掉了。沈从文没有沉浸在伟大的领袖的革命历史追述中，革命使他显得有点狼狈——无所适从。他看到，他联想到的北京景象，与

何其芳的热闹场景相比，却有一番冷静或沉静之感：“试从城头上雉堞间看看，/绿沉沉景山在对面极静/北京四野在黄昏光影中极静，/一切存在的事事物物，/似乎都十分沉静。”静的环境适合思考者沉思。和何其芳诗歌中表达的那种狂欢相对应地，沈从文却表达了自己与伟大的历史的差距：“大路上有车辆和放学归来的小孩群，/从我和‘历史’面前流过，/历史的庄严和个人的渺小，/恰作成鲜明对照。/人和人共同在历史上不同的位置，/彼此交易的悠闲，/于对比重叠中形成一个如何奇异的大综合，/似无人能够注意到，理会到。/我于是在夕阳光影里随同那个‘群’直流，/随同时间，随同历史直流，/但觉得面前一切实在熟悉又陌生。”何其芳看到的是热闹的场景，群众的力量得到展现，“密集的群众的海洋：/无数的旗帜在掌声里飘动/就象在微风里颤动的波浪”；沈从文注意到的是那些伟大场景、伟大历史事件背后的东西，“掌声淹没了话语末一段，/新中国在年青的心 憔悴的心 各式各样的人心中，/画成各种幸福式样的蓝图。/掌声平息，人散了场，/一会会，门楼上重复历史安排的寂寞和空虚，/剩余灰尘蒙蒙钟鼓相对。”他关注的是历史背后潜藏的东西，或者称为规律，“唯红墙和黄昏，与长远沉默里，/看人事悠忽，衰落和兴起。”曾经的神武门何等的辉煌，而今安在？沈从文提炼的是历史的凝重感。在时代的选择面前，何其芳没有沈从文似的困惑，何其芳是时代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之一。沈从文的困惑主要来自于其文学观与时代的差异。在文学与政治的二难选择中，沈从文试图保持文学仅存的一点净土，但在壮观的时代场景中，他的坚守显得如此地微弱。《黄昏和午夜》让人在静的环境中精神得到一种真实的洗礼，厚重的历史陈述中是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在给你讲述一段被遗忘的历史角落。

与何其芳诗歌比较的更大差异在于沈从文和何其芳在人称的指代上显示出了差别。何其芳在诗歌《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中根本没有表达自我（作为抒情主体的何其芳）的诗歌情怀，完全把自己作为集体情感的代言人，诗人成为群体的一个象征，所以我们在《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中看到了“我们”一词出现的次数是相当惊人的，共计出现了35次。高频率出现的词在诗人心目中的

地位由此可以推断，诗人写作诗歌的过程中写作姿态明显，作为诗人何其芳只能是一个代言人的身份，代“我们”抒发对时代的情感，这“我们”或许没有把沈从文这样的人包括进去。而《黄昏和午夜》中，沈从文却始终关注着“我”这个抒情主体的情感，他写的是作为诗人的沈从文的内心感受，这种感受把另一种知识分子的心态真实地传达了出来。在《黄昏》一节中“我”出现了13次，《午夜》一节中出现了11次，总计出现次数也高达24次，可见沈从文在诗歌写作中主要想表达的东西。这是由于二位诗人在写作中自己对自我身份的认识导致的差异。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午夜》一节诗歌，他更显示出沈从文的睿智。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夜幕降临后的场景和生活没有得到展现，他只是期望“欢呼一个晚上”。沈从文却不同，他选择“午夜”这一夜深人静的时候来继续思考他白天思考的问题，寻找个人的思索空间。“十一点过半，一切静寂”，在“北京二百万市民大都入睡”的时候，沈从文在乐曲的感召下，进入了思考的场景中，思考自己的历史处境，这乐曲把他带进了历史的深重意识中：“反复旋律和小小节逗，/在起始溶解我并重铸我，/把一个活过半世纪孤立者的/成见、偏持、无用的负气，/无益的自卑，以及因此矛盾/作成一切病的发展，/于时移世易中的理性溃乱，/都逐渐分解和统一于一组繁复柔和音程中，/直透入我的生命，浸润到生命全部。”历史是丰富的，不是一句简单的话就可以概括，沈从文在厚重的历史中“也依稀重新看到自己，/如远镜中窥望一颗似熟习实陌生的星子，/多久以来即和天空大循环完全游离，/独自孤寂向黑黢黢的空虚长逝，/终于还被大力所吸引，所征服，/深深融汇于历史人民悲喜中。”他看到的是大势所趋，个人在这伟大的时代的坚守又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但沈从文没有停留于此，他继续思考着个人在这伟大历史中的命运，他算悟到了，原来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人的思索是弥足珍贵的，他/她只有在“被离群方产生思索”。他终于发现属于自己的东西：“我重新发现了自己，/从风雨中消失，又重现于风雨中。/我原只是人中一个十分脆弱的小点，/却依然在发展中继续存在，/被迫离群复默然归队，/我第一觉悟是皈依了‘人’。”沈从文对现实重大的政治事件表现出一定的沉默，用他在《从

悲多汶乐曲所得》中的诗句说，就是“只记住一个原则，/将一切情感的挫折，/肉体的痛苦，一例沉默接受，/回报它以悲悯的爱。”^{[7] (P218)}那是沈从文在现实政治社会环境中唯一可以采取的姿态。

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和沈从文《黄昏和午夜》两首诗的主题明显针对新中国成立这一伟大的事件，尽管两诗创作的时间几乎一致，创作的地点完全相同，但由于诗人不同的人生经历导致的时代观、人生观、文学观的差异，形成两首诗歌的韵味

的迥异。两诗是知识分子在时代面前选择的一种最直观的表达，表现出知识分子在时代选择面前的差异性：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表达了诗人的身份优越感——时代的主人、充满朝气的青壮年，以及由此身份延展出来的诗歌格调的高昂与雄浑；沈从文的《黄昏和午夜》却结合诗人自己的现实处境表达了他对时局的看法，他更像一个被时代遗忘的老人，由此身份使诗歌显示出一种低沉而凄婉的风格，犹如挽歌的变调。这种“不同”的诗歌风格正显示出两个诗人在时代风云中的不同政治心态的流露。

致谢 本文得到杨朝晖副教授的指导，特致谢。

注释及参考文献：

①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人民文学》，1949年第1期。

②沈从文：《黄昏和午夜》，《沈从文全集》(15)，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③神武门是北京紫禁城北门，原名玄武门，神武门作为皇宫的后门，是宫内日常出入的重要门禁，明清两代皇后行亲蚕礼即由此门出入。清代每三年一次选秀女，备选者经由此偏门入宫候选。它显然见证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政治事件。神武门旧设钟、鼓，由銮仪卫负责管理。每日黄昏后鸣钟108响，钟后敲鼓起更。其后每更打钟击鼓，启明时复鸣钟报晓。

参阅 <http://beijing.yiyou.com/html/45/708.html>。

[1] 贺桂梅. 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2] 何其芳. 和天津暑期学校同学谈写作[A]. 何其芳文集(四)[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3] 郭沫若. 斥反动文艺[A]. 文学运动史料选[C].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4] 沈从文. 我的学习[N]. 光明日报，1951-11-11.

[5] 沈从文. 致季陆(1948/12/01)[A]. 沈从文全集(18)[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6] 沈从文. 致炳方(1948/12/20)[A]. 沈从文全集(18)[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7] 沈从文. 从悲多汶乐曲所得[A]. 沈从文全集(15)[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Poems Writing at the Same Time and in the Same Place But With Different Style

YUAN Hong - quan

(Chinese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The accident for new China's founding which had an effect on intellectuals' mentality has much difference, this passage is based on two poems——He Qi - fang's "Our Greatest Festival" and Shen Cong - wen's "The Dusk and Midnight". The theme of these two poems obviously aims at the accident for new China's founding, and manifests intellectuals' different choices in the time: He Qi - fang's "Our Greatest Festival" conveys identity poet's sense of superiority——the master of the time and the younger filled with youthful spirit, exorbitant and forceful poetic style; but Shen Cong - wen's poem "The Dusk and Midnight" which is connected with his reality situation expresses his attitude to the 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is poem, Shen Cong - wen looks like an old man which was abandoned by the time, which causes his poem manifesting a lowering and sad poetic style.

Key words: The Difference of Poetry style; Same Time and Same Place; "Our Greatest Festival"; "The Dusk and Midnight".

(责任编辑:张俊之)